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化发展及其理论问题

段吉方

摘要：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积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论资源的深入整合、中西文论的借鉴融通、中国话语的理论建构方面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代化的合流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原典阐释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等理论观念以西方文论反思与批判为基点，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思考开拓了新的理论路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研究等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新时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呈现出新的理论面貌。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西方文论的“中国旅行”也给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弊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反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形态建构还需充分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发展的话语建构还面临较为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新时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发展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¹，思想解放、文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历史洪流，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当代化建设展现出了鲜明的理论成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充分整合自身的理论资源，逐步产生了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主义文论等新的观念，其中都较为深入地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并对中国当下具体的文艺创作与批评实际相呼应，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形象思维研究、文学主体性论争、方法论探究、文化热的兴起、《手稿》研究的推进等的焦点性、热点性问题的研究展开，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现实主义批评、审美现代性批判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受历史与社会生产、社会文化发展大语境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并未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论分水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续80年代以来中国

1 本文中“新时期”的概念依学界通常看法，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为大致的时间起始；对于“新时代”的概念，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时间段视为“新时代”的大致时间起始。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格局与态势，文论话语更加活跃，理论话题更加多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出现以及迅速传播发展、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文论思想的大范围理论播撒构成了立体化的理论呼应，这种理论状况也给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批判借鉴域外文论的机会与挑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取得了新的发展，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¹新时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创新中发展，在时代中进步，不断面对与应答中国文艺批评实践中产生的理论问题、理论诉求，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对时代语境中的理论期望做出了新的理论解答。

一、思想开拓、资源整合与理论奋进：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承前启后

像当代人文社科很多研究领域重视 20 世纪 80 年代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存在一个“八十年代现象”，之所以称之为“现象”，是因为从现在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命题与批评观念都源自 80 年代的研究，这其中的研究状况与具体过程我们可以用思想开拓、资源整合与理论奋进三个关键词予以概括。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20 世纪 80 年代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整个文论与批评研究而言，很多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开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变化当然是与之前一段时间思想和理论格局对比

而言的，这不得不提一些重要的历史决议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语境与文艺观念上的大的背景的改变。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也给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97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6 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后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发表。这次大会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重要的会议，很多研究者总结其历史影响时都谈到是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这次会议以及邓小平的《祝词》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邓小平《祝词》是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新局面的纲领性文献。在《祝词》中，邓小平对如何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与指导。邓小平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²邓小平还提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不是说文艺研究要完全剔除或回避政治，文艺仍然有政治属性，只不过不应该简单地把文艺的政治属性放在首位，“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³除了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还强调了文艺的“二为”方向、文艺与人民关系、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 页。

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3 页。

3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3 页。

文艺的时代风格、文艺研究的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中“双百”方针等问题。

邓小平在《祝词》中提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后来也被学界概括并总结为“文艺不隶属于政治”“不再坚持文艺的政治性为首要属性”等理论描述。在邓小平的《祝词》中，他在谈及中国当时文学艺术发展时，为什么先要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开始？为什么提出文艺创作与研究不能把政治性放在首位，但文艺仍然有政治属性？显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文艺研究中的纯理论性的问题，而是与中国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思想语境有密切的关系，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探究开始的新时期中国当代文论与批评无疑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讯息，带有深深的总结历史面对当下的决心。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这无疑也是一种“思想松绑”，不同于不久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带有的那种十分明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气息，《祝词》给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开拓的动力，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这种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开始回归到学术层面”，¹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总结：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开放气息和时代意识进一步加强。在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的《祝词》等重要历史文献与决议所确定的思想基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以前所未有的喜悦、激动和开放的心态迎接“理论的春天”。《文学评论》杂志在1979年第6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章强调：“在当前以及今后的长时间内，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在进一步贯彻全会精神，促进思想解放、艺术民主，促使人们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艺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等等方面，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²可见，这也是向马克思主义文论界发出倡议和号召。荒煤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文章《为建立和发展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奋斗》，可以代表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信心和希望；刘梦溪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发表文章《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他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立，必须以系统总结我们民族的丰富的美学遗产为条件，它的生命在于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文艺状况作出新的解释，并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³邓小平《祝词》产生的思想开拓的作用很快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展现出来，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开始以高昂的士气投入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其次，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断进行理论资源的整合，特别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展现出集中的理论资源整合和理论反思的倾向，在内在思想及理论观念上不断强化批判借鉴的开放胸襟。吴元迈先生发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遗产——西方对马恩文艺遗产研究的历史考察》《苏联的文艺研究方法的新趋向》《当代苏联文艺学方法概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命题——关于“开放体系”》等一系列文章，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源的使用和借鉴问题进行重新的理论思考，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破除僵化思维、追求文论研究自觉的理论追求。其中在《“走向世界”和“让世界向我们走来”》中，吴元迈谈到：“今天人们想要撇开智利的聂鲁达、古巴的纪廉、危

1 丁国旗：《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论”之争》，《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2 《文学评论》评论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3 刘梦溪：《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这些拉美作家，想要撇开风靡全球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来描述当代的世界文学地图和当代的世界文学进程，乃是不可想象的。”¹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者的开放的胸襟和气魄，这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开拓带来的理论研究的现代观念。他进而强调：“中国文艺走向世界，是要带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独特的发现和独特的贡献走向世界的，但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它应该不断地把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艺的优秀成果溶化在自身之中。走向世界和让世界向我们走来是一个二而一的统一过程。”²

第三，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展现理论奋进的全新姿态，在思维方式、理论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积极结合社会历史语境和文艺创作现实，已经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文艺发展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特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很多理论学说已经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理论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的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对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哲学、美学思想以及蕴藉、意境、传神、风骨、趣味、言意等相关理论概念的吸收与运用，在提出和阐释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的哲学和思想关联，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中获得恰当的表现。再比如，新时期以来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也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印记，

以1978年《诗刊》第1期刊登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信为契机，全国掀起“形象思维”的讨论，很多讨论者纷纷援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维、理论观念和批评概念作为事例和个案，推动形象思维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李泽厚、蔡仪、朱光潜专门发表文章，从他们的文章中更能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在毛泽东、陈毅最先的讨论的发起与动议中，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沁润和影响，而李泽厚、蔡仪、朱光潜等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他们本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大家、专家。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发展与当时中国文艺发现的现实与实践也有密切的关系。新时期以来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论争较为活跃的时期，很多理论思潮的讨论与当时的文艺实践有密切的关系。1985年开展的“文学主体性”论争是一次讨论广泛深入，思想论争较为密集的理论思潮，“文学主体性”的论争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呼应，从文学层面上看，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在文学观、作家观与主体观上的批评反应，是主体性文学在理论上的回响，与“文学主体性”密切相关的典型理论研究、“性格组合”研究等，与当时文学和批评现实有明显的内在联系；1985年掀起文学跨学科研究高潮，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神话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实践与批评，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中的系统论等观念在鲁迅作品《阿Q正传》等研究中得到有效应用，如林兴宅等学者关于阿Q性格的系统论研究就体现了理论与批评之间的呼应关系。理论思潮的论争以及文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奋进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手稿》热、文化热、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的深化、典型美学发展、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理论研究、人道主义的

1 吴元迈：《“走向世界”和“让世界向我们走来”》，《文艺争鸣》，1986年第5期。

2 吴元迈：《“走向世界”和“让世界向我们走来”》，《文艺争鸣》，1986年第5期。

论争等与文学主体性论争、文学研究方法论变革相互映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开放意识和现代眼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哲学思维、理论观念以及方法论意识得到进一步锤炼。陆贵山先后出版《艺术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审美主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叶纪彬出版《艺术创作规律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董学文先后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建设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设想》(《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宏观研究和具体问题深入取得了鲜明的成绩。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教学与学科发展获得了有效的推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必修课、选修课,有的是综合性的理论与知识介绍,有的是专题性研究,有的是经典文本的研读教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学等专业学习与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建设不断受到重视,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性、教学型的教材不断出版,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以及近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体系性建设、经典文献研究、文论知识教学与培养取得突破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发展成果与经验,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并在马克思主义文论

1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贵山、周忠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至今已经五次再版,仍然是很多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课程的重要参考教材。

的理论建构研究和分析阐释中起到推动作用,展现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状态。

二、理论对话、批判借鉴与理论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 文论研究新高峰

20世纪90年代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高峰,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态势的延续和推动,在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面临的语境和思想状况与80年代没有太大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仍然保持了理论奋进的进取态势;二是西方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译介和研究,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进程;三是中国学者集体性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成果不断推出,学术研讨与论争更加深入,学会组织和学术活动成熟和高效,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呈现出繁荣态势,理论对话研究、西方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三者齐头并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命题、原典文论研究得到深化,特别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在此阶段获得丰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曾掀起“《手稿》热”,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手稿》研究再度引发了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论集体性的“理论重读”,朱立元出版《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陆梅林发表《〈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篇》(《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均是代表性研

究成果。

除《手稿》研究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继续深化原典阐释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阐释与当代发展研究方面不断进步,一批马恩文论经典原著选读、精读的理论著述接连出版,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选读》(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人民出版社,1991年)、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文论导读》(作家出版社,1991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及文论美学研究得到深化,陆梅林的《唯物史观与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美学研究有效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的代表作;李青春的《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1991年)聚焦马克思的人学观念,梳理探究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超越发展;鲁越等著《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探索:“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典阐释研究。

西方文论发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引进是20世纪90代以来重要的理论进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量引进产生了“西马”热。自1989年开始,重庆出版社推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著述21种;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图书,约30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论文的成果文论著作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除了这两个书系之外,还有大量的专辑、合集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文集出版,西方文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界也开始讨论更具“西马”意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当代消费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学与权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这些问题的集中探讨也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倾向的某些变化趋势,西方文艺理论译介、研究与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反思问题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主题,朱立元在《文史哲》1996年第1期发表《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提出:“若冷静客观地审视一下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状况,那么,应当承认,这种对话并非十分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平等”),即从总体上来讲,从西方引进、输入得多,而向西方传播、输出得少。”¹冯宪光在《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发表《“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和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主要现为新时期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马文论的深层次的影响,中国新时期文论的许多热点问题都与西马文论的核心问题相关。”²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引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并没有忽略中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实,理论对话研究的吁请与回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理论对话研究的目的是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实现有效的理论话语建构。董学文1998年出版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提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建构设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成为此时期的理论热点,朱立元、王振复、张弓、孙士聪等学者围绕何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建构的基本思路和所面临

1 朱立元:《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文史哲》,1996年第1期。

2 冯宪光:《“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相结合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也包括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和反思”；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基本理论建设取得突出进展，李衍柱：《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陆贵山《文艺理论与文艺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面向文学理论思潮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以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念统摄当代文艺理论话语建构。在理论批判借鉴西方文论观念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努力推进理论建构，研究视野囊括古与今、中与西、理论与现实、思想与范式等向度，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做出了积极的理论努力。

三、文本阐释、当代形态与中国话语：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视界

在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中，习近平结合中国当代的文艺实践，对人民中心论、创作主体论、作品本体论、价值效益论、真善美统一论、党的领导论等问题做出了理论阐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打磨好批评‘利器’”“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1 段吉方：《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传承中华文艺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等一系列重要理论批评原则，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纲领。

在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理论视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当代阐释研究、中国形态研究、理论问题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张永清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当代阐释》（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2年）中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阐释；蔡仪在《美即典型——蔡仪美学文选》（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2020年）中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胡亚敏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系列丛书，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研究》（孙文宪著）、《走向资本批判视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万娜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上下）（黄念然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研究》（魏天无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胡亚敏著），展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最新突破，特别是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建构》，提炼出“人民”“民族”“政治”“实践”等标志性范畴，并从“中国形态”探究文学与科技、文学与资本、文学的价值判断等当代新的现实问题，阐述了上述范畴和问题在“中国形态”问题域中的内在关联，勾勒出正在生成的“中国形态”的整体理论特质及其指向人的全面解放的终极目的，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化研究的一次优秀的经验总结。另外一些新近出版的理论成果，如薛学财《想象国民的方法：文学典型论在中国的兴起与衍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赵

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艺批评》（凤凰出版社，2019年）、吴亚南《历史抉择与逻辑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陈荣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中国路径》（厦门大学出版，2015年）、顾文豪《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蔡朝辉《冯雪峰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等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化发展。

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工作开创新理论篇章，在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围绕当代文艺创作与发展核心问题，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凸显文艺创作中的“中国形式”“中国气派”，提炼概括文艺评论“为人民”的精神与底色，不断展现文艺评论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张清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中指出：“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路，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在文艺环境、传播平台、领导方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新时代坚持党领导文艺、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依据。”¹王一川在《大片时代记忆与文化论转向》中，深入总结2003年至2012年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文化景观与艺术成就；慕羽、刘唯嘉在《新时代十年中国舞蹈批评述评》中总结了新时代十年中国舞蹈批评在公众型、学者型和艺术家型三类舞评研究取得的关键性进展，认为：“当前中国舞蹈批评已经迎来了新阶段。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人士对舞蹈的关注和探讨均有增强趋

势，为舞蹈批评带来了新思路、新方法、新可能。”²杨和平、吴远华在《共和国音乐评论70年的历史、成就、经验与反思》中总结新时代以来音乐艺术批评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评论在学科元理论、学术史、人才培养、学会建设、重写音乐史、第五代作曲家群体、新世纪中华乐派等专题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标志着音乐评论学科建设日益完善”³。文艺评论在写作研究、文艺评论基地建设、文艺评论队伍培训等方面工作明显强化，文艺评论工作在各学科门类艺术的创作评价、文艺评论与时代要求、文艺评论当代功能发挥等方面展现出繁荣发展的新的精神面貌，体现了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守正创新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开始受到西方文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域外文论的“中国旅行”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由于中西方文论不同的哲学基础以及理论话语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西方文论在引入具体文本分析与批评阐释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从而引发了当代西方文论有效性辨识问题。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掀起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研究，并引发了中国当代学界的深入讨论。2015年，张江出版《原点、焦点与热点》（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作者能不能死》《阐释的张力——强制阐释论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反思。2017年，张江又提出“公共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

1 张清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 慕羽、刘唯嘉：《新时代十年中国舞蹈批评述评》，《民族艺术研究》，2023年第1期。

3 杨和平、吴远华：《共和国音乐评论70年的历史、成就、经验与反思》，《音乐探索》，2020年第1期。

4 段吉方：《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的“守正创新”：理论、路径与任务》，《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

6期)的理论概念,积极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2022年,张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再次发表《公共阐释论》,倡导公共理性及其阐释学意义,强调:“公共理性是阐释为公共的基本根据,是激发和推动阐释的积极动力,是约束和规范阐释的框架标准,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尺度。公共理性在公共阐释中实现功能,公共阐释在公共理性引导和约束下展开。公共理性为阐释立法。”¹张江的阐释学研究“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²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以来,这个时间不算短,足以让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生重要改

观与转型,同时,在这样一个时间长度内,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更新了观念,锤炼了方法,突出了理论批评的效力。但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仍然有一定的不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发挥自身理论传统的优势,凸显特色理论范式,这是目前需要研究与探究的核心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强化原典阐释研究,继续深化理论与批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凸显问题性、实践性,这将是接下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核心任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7ZDA2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

1 张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2 段吉方:《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广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广东新时代文学繁荣”专题约稿函

在改革开放和新时代背景下,广东文学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何继续深化发展、更臻繁荣,需要各界人士特别是文学界人士的更多努力。欢迎关注广东文学发展、关注广东文学创作的学者和作家为“广东新时代文学繁荣”专题献计献策,撰写大作。文章可以结合历史、现实,也可以与外界对比;可以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也可以指出问题、表达批评;可以针对文学问题、文学现象,也可以结合具体文学创作发表高见……只要言之有物,针砭问题,我们都特别欢迎。

稿件最佳字数在5000-10000字之间,符合本刊体例需要,请在文章前加上200-300字摘要和3-4个关键词。

来稿请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邮箱 ygadwqwpl@163.com,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广东新时代文学繁荣”字样。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编辑部

2022年12月